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Der Verrat der Intellektuellen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朱里安·本达◆著

孙传钊◆译



YZLI0890068302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Der Verrat der Intellektuellen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 朱里安·本达 ◆ 著

孙传钊 ◆ 译



YZLI0890068302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的背叛 / (法)本达著;孙传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88-1

I. ①知…

II. ①本… ②孙…

III. ①知识分子—道德—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75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827 号

知识分子的背叛

著 者:(法)朱里安·本达

译 者:孙传钊

责任编辑:崔文辉 崔 凯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6.25 字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88-1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安德烈·洛夫的序 [1]

《知识分子的背叛》有再版的必要吗？本达 1924 年开始执笔，1927 年此书才付梓，历经 3 年之久。1946 年得以再版，朱里安·本达特意写了重要的新前言。1958 年出版了第 3 版，附了雷纳·爱迪安勃尔的序；以后 1965 年又再版了一次，即出了第 4 版，其中有删节，就是让·耶克·鲍威尔社版，现在已经很难觅到原书。

1927 年本达发出的警告，站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的人们看来，那论据是不充分的。1975 年，我们回过头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重读的话，此书作为一种奇特的预言一般呈现在眼前。本达强调的是普遍的事物，因此，这样的观点能够经得起时代与历史的双重的检验。1927 年以来突发的各种事件增强了他的关于“人类精神的永恒性”的观点的依据，使得他当年的分析再度显得格外的清晰。在这个序言中，我将要涉及最近的一些历史事实。将言及的这些事实作为例证，来说明这部著作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也不过分。

朱里安·本达是个反潮流者。他逆时代潮流而动，强烈地、热情地、果敢地提倡普遍的价值。今天，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作为经典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又一次再版。这部书与他的其他极其抽象的著作一样，值得人们愉悦地饶有兴味地阅读，而且，具有让人一再重读的魅力。我想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出色的自传。

执笔这序的笔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哲学家，读者也很容易发现这

一点。此书这次再版之际，有一位科学家得到朱里安·本达的夫人充满情意的嘱托，把写序的任务交给我，几经婉辞，盛情难却。这位科学家也是个书痴书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他也是位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新法兰西评论》的热心支持者。从该杂志创刊起，他一直赞赏本达，阅读、关注本达的论文与著作。

两次大战之间，由于作家的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那样的文艺思潮大流行，像火花一样点燃、照亮了文学的上空，那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然而，在这样多彩的年代，朱里安·本达却进行着他那严厉的说教。这样过分严厉，也会带来使得文学变得萧条的危险。当然，当遇到作家只是凭借其灵感与想象力的时候，再做些严格的挑剔也未尝不可。但是，往昔也好，而今也好，总有些作家和哲学家背离了理性的严格要求，自称是作为科学家的行为，背叛了他们本来的使命。成为朱里安·本达批评的目标的、成为他批评的牺牲品的，就是这些人。

笔者采用的是违背常规的书评写法，所以，这篇序的大半是剖析本达的著作，似乎也作了些特别的分析，却毫无惊人之处。读者所深感兴趣的是本达的观点，而不是介绍这部著作的人。这序（笔者所谓的分析），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也是因为没有背叛本达，得益于他的思想，而且也因为屡屡受益于从他那难以阐释的书中的内容。虽然不是全部，我都一一用引号标出。

在这里我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部精彩的著作，本达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所以，我的名字竟与本达一起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对于这样不妥的做法，内心充满了不安和踌躇。

现代世界，把理想作为绝对的东西加以护持的知识分子、纯粹的沉思者的存在，是大有必要的。这样的理想，必须由知识分子把它从混沌世界中分离出来，划定于一种境界之中，并加以定义。所谓无秩序，其一部分是从价值观的混乱、从价值的定义自身使得价值僵化起来乃至使



得价值丧失那种奇特的信念造成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诉说普遍的价值，可是不少颂扬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却背叛了自身的职责。所谓知识分子的背叛，就是说他们拒绝普遍的价值，使精神的东西屈从于现世的东西。

知识分子与知性的价值^[2]

朱里安·本达定义中的所谓知识分子，“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即追求达到获得超越的善那种愉悦的人类的某个阶层”。

知性的主要价值，就是正义、真实与理性。这样知性的价值具有三种特性。即静止的、超越的和理性的。实际上，这三种特征是超越了状况、时代和场所的多样性，各自又是相似的东西。概括地说，是处在现实的外部。那是抽象的、概念的价值，而且是与人的意识是不可分的。

正义、真实与理性，只要不是将实际目的作为目标，就具有知性的价值。理性是批判和理解的根本。如果，为了世俗利益而被使用的话，那么，这事物已经没有知性的价值了。真实其本身就是善，与一切其他的目的没有关系。本达的思想源泉，来自于柏拉图（静止与运动在希腊的对立）和斯宾诺莎（真实是追求纯粹的知性感到喜悦的源泉，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应该受到尊重的是：真实，对其带来的结果丝毫不加以考虑。艺术活动，其本质是超越的，和科学一样，不仅和人类的物质是无缘的，和道德的善的探索本来也是无缘的。这也就是知性的价值。

这样的价值中，那些不是根据理性的、而是依据情感的狂热、勇气、信仰和人际的爱等都是被排除出去的。“基督教中，只要谴责‘生的奢侈’的罪过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这样谴责，将会有不知道多少倍以上的恶行发生。”对待这个论点时，本达遇见了阿维洛埃斯（Averroes，阿拉伯的哲学家，1126—1198年。——译者）。他们认为：“基于期待报酬和恐惧惩罚的道德与人、都是与神不相应的，

那是反道德的。”

从上面所见，知性的价值是受限制的，是受约束的。因此，当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理想。从斯多葛哲学到斯宾诺莎哲学都是从这种理想、从定义出发的实践，是面向某些贤者提出的要求。也许还不能够达到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这样的实践必然应该是接近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尝试。

知性的价值与国家

如果国家专门基于知性的价值，国家的建设就变得不可能了，国家也不能够维持下去了。这是极其明白的事情。

“在所谓知性的真实的宗教名义下，想要处理各种各样人事，是一种宗教的神格化，即选择的不是人间的事情。”

国家只能够在现实主义中存在下去。当然，国家领袖们常常采用现实主义。但是，过去，他们并不尊重现实主义，而且并不强调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是道德的。马基雅维利是这么宣传的：比如邪恶，即使为政治服务的时候，也仍是恶。马基雅维利是现实政治的理论家，劝说人们同意只是把知性作为一种借口来使用，他们让人接受的政治秘诀是把邪恶也看作一种知性的善的见解。这一秘诀经常被人们使用着，《知识分子的背叛》刚出版时（1927年），那个时代盛行的这种秘诀，既是对普遍价值表示敬意，又对普遍价值表示侮辱的一种秘诀。

如果理所当然地考虑这些所有的要素，就不能不确实承认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走向没落。那是为什么呢？就像朱里安·本达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灭亡后，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出现值得人们爱的国家，而且，与今天相比，知识分子也容易去追求精神世界。事实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要超越各个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问题，阶级的对立、意识形态的斗争等等，是非常困难的。现代世界，要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与作为一个与知识分子头衔联系在一起的是：

他也是应该是一个服从所有的义务与责任的市民。很多的知识分子就陷入了政治的热情之中去了。这种所谓的热情“在利害与自尊心的名义下，使得他人相互对立的热情，还要从这对立出发制造阶级的对立与国家的对立两个最大典型的对立”。很多形式知识分子为了故乡与祖国的利益，牺牲了其原来崇拜的普遍的价值，更加极端的例子，他们或无视普遍的价值，或干脆完全忘记了这种价值。某些人或表明无视正义与道德，或声明在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国家的观点以后才顾及正义与道德。比如，先从政治的观点来考虑，如果从政治标准被认为是好的事物，才可以承认那是善的。某些国家，国家的基本法规成了宗教信仰的规范。就连与任何政治目的没有关系的事情，战争也会被颂扬，好战的精神也会得到辩护。基督教也被赞扬成“只是一种实施出色的、适合伟大的人类社会创立的、建设的、实际的道德学校”。莫里斯·巴雷斯这么声称：“无论怎样自豪的人，只能够考虑阶级的正义。”极左派或极右派，在蔑视普遍的价值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这对于他们的活动家来说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普遍的信仰，是相对于人类精神的基督教的遗产。在本达执笔此书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的说教，即“日耳曼价值”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这价值也为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所采用。这种说教不仅标志着希腊主义的破产和普遍事物的终结，也导致了涌现出强烈的征服、统治和强制的欲望，把自己看作特殊的、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种族思潮的不断发展，乃至产生不可避免的、直接的结果。还有，只要是把自己看作是理性与真实的唯一的拥有者的话，也会导致出促进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

还是重复这么一句话，尊重知识分子的理性的国家将遭受亡国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本达完全有先见之明。他说：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的说教，或者知识分子委身于实际的热情，一点也不知羞耻，假如赤裸裸地，并且一点点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上升到另一

境界，那样的状况，远比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应该感到可怕。”

知识分子与国家

如果假设知识分子只是在文明的国家的体系里，那么只有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普遍的价值的发展才有可能。人们非常反对本达要把永远的价值和冥想作为一种职责交给知识分子，没有再比这种指责更加错误的了。《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是这么明确地表述的：“知识分子，即使继续作为知识分子，为了在向这个堕落的世界导入神圣的价值，确实可以下降到那个世界”……“知识分子甘心情愿接受相对的东西，能够获得何种程度的人性呢”。……本达继续说：“但是，这种世俗的人们的边上，必须有知识分子、纯粹的思想家在那里。后者正是绝对地守护理想，当理想走向现实的时候，以拒绝接受那种当然要接受的被歪曲形态而告终。我想，教会的传教士或那种听取赎罪坦白的神甫的边上，也必须有写作《基督教须知》的孤独者。”

现代却不喜欢冥想家，只尊重行动家。知识分子将取何种立场呢？本达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

“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但是，对左翼的政治也必然有不同意的东西。涉足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功能，是强化权力、效率和秩序等及其价值、追求国家的利益。这些与精神世界的力量是不同的东西。

“精神的功能是为了接受其本身原有的价值、坚持这样立场的最终结果——精神驱动着理性对国家事务置喙的结果，精神将必然遭到国家的镇压。对精神的压迫，国家从自己的立场来说这是自卫，所以，对以逻辑为根基的精神发出的愤慨当然感到吃惊，但是，相反，精神成为国家的奴婢应该远远叫人吃惊。”

朱里安·本达的推论是从逻辑出发的，也是现实的。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荣誉和强大，正是他们对静止的、超越的、理性的及普遍的价值崇拜。“知识分子只有在对人们宣称自己的王国不属于世俗的现世的时候才是强有力的……”，所以知识分子学说的影响力与其不具有实际价值没有关系。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以向世俗的人们叙述使他们不快的真实，使自己内心不至于陷入悔恨作为代价的。“知识分子背着十字架，他们的教诲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叙说普遍的价值。蔑视这种价值、全力以赴颂扬大众的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背叛了自身的职责，使精神的东西隶属于现世的东西的知识分子是背叛他们自身的职责。

科学与道德

所谓科学，是基于理性的作用、基于真理的探究的活动。这在不超越其目的的条件下，成为知性的价值。朱里安·本达是这么说的：“我把精神丰富地预测现实叫做思维。”（《关于观念的类型》）

“所谓思考，是强调精神，是活动。思维的精神是对外部的反应。”……“不思考或者只是稍作思考的人们，不能够对外部的给予作出贴切的反应而接受外来的影响。”

近代的人类，他们的大多数是接受这种影响。科学成了思维的学校。

“科学所依赖的方法是有教育价值的，但是，那是不断验证、不断探讨、不断地纠正错误并且加强对感情的诱惑作持续斗争的结果。……科学活动几乎都是与社会目的没有关系的活动，所以是孕育超越性的学校。而且，正是从这出发才形成了高尚的道德价值。”

科学的方法和理性的运动一起展开，来促进对真理的探索。“但是，在这中间不具有为创造正义的任何权能。那是因为这样的创造不过是道德意志的结果。”即这所谓道德意志是不具有任何科学的成分的。“作为那样的科学家，没有解决关于人类善的问题的资格。”本达的老师莱努维



尔是这么认为的：关于善的探索应该与科学，与艺术都是无缘的。

伦理学是一门判断善与恶的学问，是在将经验与理性相互对照之下诞生的学问，是概念与问题综合化的结果。善是显示道德要求，美是显示艺术的价值，而真实显示的是科学活动的价值。真实与善是不能够混淆的，与没有说教的艺术一样，也当然不存在科学伦理学或学术伦理学。因此，本达认为无论怎样高尚的事物，如果为了某种“大义”贡献上学问乃至背叛学者的职责、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不可宽恕的。

即使如此，实践这样的严格的准则的典型、榜样是不变的（也不是从如具体的成功啊、好结果啊，那样间接的方法来例证、决定的，而是从这实践本身来推论的真实性来例证、决定的）。这种严格的准则，只要清晰地描述了合理与非合理的境界，就能成为范例。只有在这中间，才具有道德的意义。学者寄予社会的善只有根据这样严格的准则去实行。

知识分子与真实

真实是知性的价值。米格尔·德·乌纳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诗人。——译者）笔下的某个人物这么说：“所谓真实的脸，应该是可怕的。因此，对于大众来说，神话与幻想是必要的，而且接受蒙骗也是必要的。真实是某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毁灭的东西。”这样的观点，这样严酷的观点，不仅仅是“大众”持有，知识分子也持这种观点。总之，把真实及探索真实作为神话与神话的庆典、或把思想作为戏剧的写作方法、或把观念的逻辑展开变成漫无边际的梦想，是知识分子；把不是理性主义的东西、把完全是空疏的胡说八道称作严密的教义并且加以盲目信仰的也是知识分子。

几年前，一位杰出的英国科学家在英国发表批判达尔文观点的文章。他的分析的光芒的照耀下，耶稣会的神甫的许多主张都变得难以成立了。他的推理极其严密，批判也极其贴切。因此，笔者与法国所有的定期发行读物联系要求刊出这论文的译文，都遭到了拒绝。信仰者，把神话看

作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他们偶像的倒塌会成为他们自身判断错误的过失。爱梯安勃尔说到本达的时候，曾经提到“策划着沉默的阴谋的某武装军团”，这个“沉默的阴谋”是组成整个社会的一个要素。本达首先当其冲成了牺牲者。人们不能容忍本达指出了柏格森的谬误而且还苛刻地批评这种哲学。柏格森是不能冒犯的。人们当然也不允许他批判某思想家、某教会、某极权主义国家。那么，把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俗称，该大学最初是为贫穷孩子设立的学校。创始人是索邦（L.de Sorbonne）。后变成神学研究中心及教皇之外的最大教权机构。1790年被取缔，校舍为巴黎大学接管。——译者〕著名教授“跳舞的伊斯兰教的僧侣”（参照后面爱迪安勃尔的序言——译者），要从怜悯的情感出发？而解剖同时代人的著作指出其对精神所取的态度的错误，要从礼仪出发？朱里安·本达的严厉、顽固而且无情。他谴责浪漫主义，控诉狂热、流行，揭露虚伪的荣誉，瓦解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话。他的著作（人们也许为之大吃一惊）引起了诸多的憎恨，至今还回响着这种余音。

朱里安·本达十分厌恶各种党派。他既不是巴黎高等师范的毕业生，也不拥有大学教授资格，连“哲学者”这样文绉绉的头衔也没有。大学的哲学界轻视他可以到不屑一顾的程度，还要给他戴上使之沉默的口罩。从词源来说（指知识分子的词源为 Clercs——译者），应该热爱知性的人们却公开鄙视这么一位典型的贤哲。他那辛辣的严厉（这确实不得不承认）击中人们心中的要害，对他们的自我满足发出当头棒喝。虽然也能得到几个人的称赞，却招来更多人的厌恶，于是，人们常常对他产生误解在《拉尔斯大百科全书》中《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被定义为“论述反知识分子观点的小册子”，让读者感到小册子的作者像是某个匿名的玄学者。

理 性

真实、正义、理性是三个普遍的价值。但是，理性超越其他两个价

值。理性，仅此而已就能区分正式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康德批判理性，他在 1781 年承认，理性是作为原理的真实的有可能性的论证、所有的判断的必须条件与基础。

不用说，无论什么国家就连嘲笑真实、正义、理性的时候也还是这样，依然特别强调尊重理性。那就是现世的东西向精神的东西表示敬意。不管怎么，在正义与真实的框架里，在理性的名义下，要明白地去侵犯那两种价值的行动是大家一见就会感到困难的事情。所以，新的逻辑（矛盾论的逻辑）、新的理性（唯物辩证法）被发明了。

所谓矛盾论的逻辑是个奇妙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超越的，是把活的事物内在拥有的“对矛盾的权利”作为前提的。能够理解的人自然会理解，但是，对这一点做更详细介绍也是白费的。在关于五年计划的演说中，斯大林为“活的价值与斗争手段”的矛盾辩护。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仅举此例已经够了。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按照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的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行动哲学。

“那也是人民哲学，是讨论社会现象的最好的方法。但是，这不是背离科学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类社会包括看作个人存在的所有生物学的特性，就各个人而言，生理发展的过程是跟从物理学、化学的法则的。因此，唯物辩证法不是在自然科学的边上，而是包括了自然科学。”

本书及他的其他的文章，本达的结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叙说一种永恒的真实，承认的只是由每时每刻的利害决定的真实。因此，本达在矛盾论与唯物辩证法中发现了重大的危险，为了理性与普遍的价值，不断与之斗争。他认为，另一方面为了捍卫哲学也要与之斗争。有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是曾经这么宣称吗：“所谓哲学，就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

今天问题更加显得重要，有必要按照具体的事例进行一番探讨。前面提到的那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是这么写道：“最初把唯物辩证法运

用于自然科学并取得成功的是苏联。”这个所谓的成功是什么呢？1935年，有位无知的幻想家（以前，神圣的俄罗斯时代会把这种货色叫做大胆）创造了一种新的遗传法则（指李森科——译者）。他否定染色体与遗传因子的作用，并把所以的古典的遗传学理论都打成反动的、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是毫无价值的。而且那些资产阶级的理论的目的都是要使得人民吃不上饭，所以都要批判、打倒。对古典遗传学，他还提出因为量化统计决定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既定的教义，所以也必须批判，不能采用。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把他们看不入眼的理论说成是理性主义，并指责是“概念化”（其实是为了贬低这些理论）。这样，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强调那些理论是理性主义的，一边却又不承认它们的理性主义。比如，好像理性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一样，把《现代理性》杂志改名为《思想》，再加上一个“近代理性主义机关刊物”的副标题。

话题回到古典遗传学上来。这样的学说一下子成了异端了，被批判了。遗传学的著作都被毁弃，遗传学研究者被送去劳动改造，乃至判处徒刑。用近似疯狂的用语解说来取代了原来的遗传学的教学。东欧等兄弟国家也积极地追随着选择这种做法，这样的疯狂持续了40年。

40年后，唯物辩证法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在苏联，生物学被取消了，其学问成为人们嘲笑的东西，然而，它的农业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虽然，国民们可以头脑里没有染色体的概念生活下去，可是，没有面包却活不下去。在农业困境现实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做一些修正了。几乎是丢脸了，尽管古典遗传学这样具有资产阶级根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东西也被平反了。还活着的遗传学研究者回到了研究室里，再度获得了教授遗传学的权利。已故的遗传学家也获得了平反。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控诉是在一场煽动性的喧嚣的闹剧中进行的。无产阶级遗传学从舞台上消失了。在经常发生无辜的人们成为冤、假、错案的牺牲品的国家里（对谁？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负有制造悲剧的责任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却不受任何处分。但是，有位苏联的遗传学家以极其丰富的资料写了



一部详细记叙这一事件全过程的书得以出版了 [这位遗传学家是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1967年写成书后在苏联国内不能出版，结果几经辗转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Zhore A. Medvedev, 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 1969)。此书1979年被译成中文，书名译为《李森科沉浮录》，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内部发行——译者]。这位作者当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实际上，那里确实有精神病患者，但是不是这位作者，而是那些无产阶级遗传学的发明者及其批评运动的主谋们患着精神病。若根据精神科医学理论来说，这是一种整体的、慢性的谵妄症状。这种谵妄在有秩序的、具有自始至终一贯性的、明晰的世界中进展着。由这种伪善要素构成的逻辑体系确立了它自身的各种特征。妄想伴随着想象的或情感的解释与发挥，导致一系列的概念的、情绪的混乱。患有慢性谵妄症的病人也就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对真实与现实，都不是从理性出发去思考的，而是从妄想出来的概念去思考的、去行动的。如果参照一下上述事件进展的年代刊出的文章，不难可以下“疯狂发挥的发作”这样的诊断结论。信徒们患上了以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科学为病原体的系统的谵妄症。他们失去了理性。最后我要指出的，法国的科学家们，特别是生物学家（其中也有遗传学家）也和这种疾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还有一个希望大家注意的问题。上述遗传学事件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意选出来的事例。因为这事件只不过是个很能够显示理性、真实与正义被抛弃而导致破绽的例子罢了。这样的考察，也一点不是那种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专门以否定普遍价值为目的的。这种否定并不能够使得自己这种理论必然胜利，而且恰恰相反，会使得自己的理论的实现变得迟缓起来，或者变得危险起来。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确实厘清了到今天为止被遮蔽了的历史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一边也使得其自身的教义的超神话化变的可能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贪图那种惰怠（顺从主义）。他们即使强调把历史分析、解释的方法运用于知性的别的领域（比如，在国是的名义下），其背叛自己的职责



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再回到古典的、科学的遗传学和无产阶级遗传学的对立的话题上来。面临危机的真实不仅是科学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也是历史的东西。当然，你把它归入哪一类都行。我想确认的是一种状况（即使在这个领域，或者其他诸多的领域），即所有的真实像病毒一样都已经穿透了某种类型国家的基础，而且在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理性通过真实去实施就变得更加危险。谎言（不是错误！）从古代以来就是政治的手段，但是，今天的谎言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说规模的变化是因为谎言成了大陆维度的东西了，而且，因此也有了史无前例的普及技术与说服方法；说性质发生变化是因为谎言不仅具有政治力量，而且也追求精神装置的变化。谎言必然成为国是、统治手段。我们应该忧虑的是：事态会发展到哪一步。

教会（这个词我是作为其成员共同具有同一的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信仰的共体的广义上的概念使用的）中，当权者成了一个人，或者是成了一个小集团。要实现他的意志，当权者必须拥有并且保持他的权威。然而，若他的各种决定在讨论中不能被同意，这也就宣告了自我的完全丧失。行使绝对权力只会带来一种错觉。于是，当权者完全不能掌握他的权限了。而在无缘的领域（艺术、学术）中是按照既成的规定去实施意志的。出于这种原因，当权者确信宗教对于民众来说是必要的。他就要创造神话，宣布教义，培养信仰。让使徒反复诵读经典也就是让理性深深地长眠。信徒要退化到批判的能力消失，个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只会作出机械的反应。因为理性被驱逐了，谁也不能搞清楚哪里有真实了！因为已经没有真实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正义在何处了。当权者提出的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行为都加以接受，制度被拟人化了，于是就开始条件反射地进行表示崇拜的祈祷。那时批判都成了对神圣的亵渎，叛逆者将被抽筋剥皮。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特别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纳粹的德国，多种症状都显示出

来了，不用说那当然不是民主主义的特征。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现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对政治家、社会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来说，这种现象有很深刻的意义。但是，对于考虑普遍的价值一词内涵的知识分子来说，无不疾首痛心。

统 合

没有静止的科学。科学必然是动的。科学的概念只有在不断地修正中进步。如果把理性视为不变的话，那么，进展中的科学绝对是不断革命的。科学只有在自由里才能发展，不承认超越自己的力量，不用说，除了理性的力量。然而，和科学同样，艺术也创造了人类的精神。可是双方的进展过程是完全不同的。若说科学的话，那是不断地探讨理论，在人类中有诉说有关进步的话语的权利。在艺术领域，完全是另一件事情。作品由其本身来完整地了结，或某种完美无缺被超越的事是没有的。完美无缺，可以无数次地完成，可以接二连三产生艺术形式。与科学的形式相反，不是显示进步，而是表现出更新。艺术没有进步，但是有变化，无论什么形态、无论什么新样式，也会与学院派、极权主义国家所墨守的传统发生冲突。

绝对的组织一旦决定了艺术创作的规定，那么艺术将要反复地被埋葬，即宣告死亡。出于这个道理，作为避免世界单一化、机械化、人类成为机械的奴隶的必须的解毒剂，艺术是必要的。在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政府当局即使是保守主义的，也不阻碍艺术的进步。这样的进展即使出自于某种组织，那也是在外部发生的。在极权主义国家，和科学一样，艺术也是被从属于政治的狂热，经常会遭遇成为妄为、绝对决定的牺牲品的危险。实际上，艺术成了权力的奴隶。

对于康德来说，判断力是美的感觉的基本要素。他从所谓普遍性的性质预见到这将是与道德感情有亲缘关系的东西。所有的事物在普遍价值的领域中是相互关连的，那也能够作为整体，或者作为组织来考虑。